

出“水” 古碑透露区划信息

1983年，黄河故道坝子街桥东南5米处出“水”了一块古碑，碑题为“汉留侯张公讳良字子房墓道”，为明嘉靖十八年（1539）直隶徐州知州陆时望等立。张良，字子房，为汉初三杰之一，封为留侯（今沛县、铜山区交界处，留城现淹于微山湖底），死后葬于留城附近的微山岛上，2007年重新立于黄河故道的出“水”地点。现在微山岛上有张良墓及墓碑，但文献资料中没有该张良墓道碑的记载。

发现墓道碑的地点大致位于通往坝子街土城的渡口一侧，推测可能是张良墓道碑刻好后准备运往微山岛，因沉船而流落此处。该碑先是存放于徐州博物馆内，2007年重新立于黄河故道的出“水”地点。

从碑上文字“直隶徐州知州”可知：明洪武十四年徐州升为直隶州，直隶京师，永乐迁都后归入南直隶，直至明末未变。

明朝的南直隶是一个重要的行政区划，是明朝处于南方、直隶中央六部的府和直隶州的区域的总称。

明洪武初年，直属京师南京的地区为直隶。明永乐十九年（1421），明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，裁撤北平布政使司，将原北平布政使司所辖府与直隶州改由中央六部直接管辖，遂称北直隶，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北京、天津、河北等省市。原京师改称南京，原京师地区改称南直隶，辖区基本不变，以区别于北直隶。南直隶与今江苏省、安徽省及上海市二省一市相当，与山东、河南、湖广、江西和浙江接壤。

虽然明朝时期的行政区划并未明确使用“省”的名称，但北、南直隶在行政地位、地理范围、政治与经济重要性等方面都与后来的“省”有着相似之处。

同时还出“水”了清雍正六年（1728）《禁碑》，碑面高105厘米，宽52厘米，竖写11行，转行标符不计，正文凡312字，是当时在任徐州知州白洁发布的一则禁令，内容相当于今天整治车站码头的一则治安通告。

在政府领导、社会贤达、新闻媒体的共同推动下，2007年将该碑内容再现于古渡。但《禁碑》蚀化剥脱非常严重，不易释读，笔者虽竭尽全力亦有错讹，幸为赵明奇、李银德等师长斧正。

摘录如下：特授江南直隶徐州正堂加三级记录五次白：为严禁渡船任意勒索，以便民事，照得设立……计开：轻身过渡每人止许一文……如违重责三十板，枷号一月，不恕！雍正六年十月日示。

这里的“江南直隶徐州”诸词披露的相关信息为：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清军人关后沿袭明制，设立江南承宣布政使司，废除南京国都地位，管辖范围为明

代南直隶旧地。顺治十八年（1661），因该区域地域广袤、政务繁重，朝廷将江南承宣布政使司一分为二，划分为江南右、江南左两大布政使辖区。

至清康熙初年，清廷统一改革地方建制，将全国承宣布政使司统一更改为行省，江南承宣布政使司随之改称“江南省”。江南省区域包括今江苏、安徽、上海全境，以及浙江北部和江西、湖北的部分县域，江南一省的赋税占全国的三分之一，每期科考江南省上榜人数约占全国一半。

清康熙六年（1667），朝廷因江南左布政使所辖最大府为“安庆府”“徽州府”，故定名为安徽布政使；江南右布政使所辖最大府为“江宁府”“苏州府”，故定名为江苏布政使，“安徽”“江苏”两个省名由此正式确立。



明初，徐州与京杭大运河位置示意图。
陈钊 绘图

“N省通衢”的城市知多少

年《清史稿》引述胡林翼奏疏：“武汉尤九省通衢。”（指向一：依据《广阳杂记》，转运货物区域为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湖南、江西、河南、江苏、广西；指向二：依据民国《夏口县志》，水运航道归纳为四川、云南、贵州、湖南、江西、河南、江苏、安徽）；山东省滕州市，据明万历二十三年（1595）《滕县官道碑》载“滕县系九省通衢”，指向不详；河北省正定县，据清嘉庆年间《清实录》称“正定系九省通衢”，指向不详；江苏省淮安市，据晚清淮安本土文人范冕《吟清江》载“九省通衢石码头”，指向不详。

“十省通衢”之称的有：河南省洛阳市，光绪年间洛阳城定鼎路过街牌坊记载，洛阳“十省通衢”，指向不详。

对比以上“N省通衢”的共性，“三省通衢”“四省通衢”均位于多省交界处，陆路交通发达；四省以上的“通衢”一定要加上水路综合计算；九省以上的“通衢”除本省外，还要水陆并进，东西南北各辐射两个以上的省。

徐州历史文脉彭城七里的北端，黄河故道庆云桥东南的黄楼景区里，有一座古韵牌坊静静矗立。牌坊上高挑舒展的飞檐凌空翘起，层层繁复的斗拱交错堆叠，榫卯结构精巧绝伦，南面横梁上题有“五省通衢”四个大字。

文献记载，此牌坊始建于清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，由当时的河道总督黎世序所建，牌坊的临河一面题有“大河前横”四字。清光绪九年（1883），徐州道尹赵椿平对牌坊进行了重修，并在牌坊的南侧一面书写了“五省通衢”四个大字。如果认真观看会发现，现在上面的“五省通衢”四字，是清宣统元年（1909）徐州道尹韩椿章所题，这是因为牌坊又经历了一次维修。

知道徐州是“五省通衢”的人很多，但知道通哪五省的人很少。这是因为各类文献、各类出版物、各类媒体自媒体也各执一词、相互矛盾着呢。

■作者简介



陈钊，徐州博物馆文博副研究员，徐州市两汉文化研究会展览交流部主任。主编《徐州考古资料集成：1953—1985年》《徐州博物馆攻略》《佳谜助记两汉史》，参编《大汉楚王——徐州西汉楚王陵墓文物集萃》等。



禁碑。 陈钊 摄

读懂碑刻，解密徐州『五省通衢』

“五省通衢”只是徐州的昨天

大利好。一城之内同时存在中央户部派出机关、省级道级军政机构，同级别州城中极为少见。

户部主管全国漕粮、财政，在徐州设立户部分司，属于中央户部直派机构，不归地方管辖，专门监管广运仓、漕船盘查、粮价、漕税；徐州拥有直达中央的财政漕运管理权限，行政规格远超周边府县，各地州县漕运事务都要至徐州报备，强化区域中心属性。

明代设徐淮兵备道（徐淮道），管辖徐州、淮安一带河道治安、防汛、兵防、盐务、流民管控，统管黄运交汇要害。徐州是黄河、运河两水交汇，水患、盗匪、私盐、漕运冲突多发，徐淮道手握兵权、监察权，成为淮海片区军政管控核心，客观上让徐州成为区域行政中心，鲁南、皖北、豫东物资流通、公务往来均以徐州为枢纽。

此时从徐州登船，向北可直达直隶（今河北省），向南可直达浙江省，彻底奠定了“五省通衢”的区域中心地位，徐州在明代达到水运城市的历史鼎盛阶段，是“九州之一”之后，徐州历史上的又一高光时刻。

清顺治二年（1645），清政府将明代南直隶改为江南承宣布政使司，至康熙初年，又将江南承宣布政使司改称“江南省”。

清康熙六年（1667），江南省被拆分为“安徽”“江苏”两省。此时的大运河河道破损淤塞严重、险滩失控、通航时断时续、漕运效率低下，虽有多次大规模治河，但大运河运力始终未能超越明代鼎盛时期。

清嘉庆二十三年（1818），时任江南河道总督黎世序在徐州同步推进两大治河工程。当时，以徐州为枢纽的大运河虽然也可以直通直隶（河北）、浙江二省，但此时徐州运河河床淤塞严重，长期依赖借黄济运，黄运冲突、堤工老化等隐患积重难返，整体通航条件、运行稳定

性远不如明万历开淤河之后的稳定鼎盛时期。

因此，治河竣工后在徐州城武宁门（北门）外石台上立牌楼，匾额上黎世序没好意思写“六省通衢”，而是写了“大河前横”四字。笔者理解的意思是：“修或不修，河就在那里——诸君任重而道远啊。”

清咸丰五年（1855）黄河在河南铜瓦厢大改道，于山东张秋镇拦腰冲断会通河（山东运河），致山东运河淤塞。

清光绪九年（1883）时黄河北徙，南北运河被黄河隔断，无法通航直隶（河北），因此重修城北牌楼后，徐州道尹赵椿平在“大河前横”背面题写“五省通衢”，追忆昔日盛况。笔者理解的意思是：“遥想运河当年，京杭贯通了，千帆竞发。”——当然，如果有人非说清朝人只能怀想康乾盛世时的“五省通衢”，那就把“南直隶”换成“江南省”，其他都一样。

随着大运河的通行状况日益恶化，清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，清廷正式停漕，裁撤河道管理官员，朝廷不再统一疏浚全线运河。到清宣统元年（1909），山东中段运道长期失修，南北水路彻底隔断。因此，当徐州道尹韩椿章再次重修牌楼后，只能无奈地再次题写“五省通衢”。

也正是在这一年，津浦铁路徐州段已开工一年，两年后的宣统三年（1911）徐州拥有了第一条铁路；再过两年，1913年陇海铁路汴徐段（开封至徐州）开工。到1915年，徐州拥有了第二条铁路——徐州重回了国家级交通枢纽。

“五省通衢”只是徐州的昨天，不是今天，更不是明天。当维护运河运营的工部分司衙门变成了为铁路培训人才的“扶轮中学”（后发展为铁路职工子弟中学，即后来的徐州市第三十五中学），正如伟人说：“萧瑟秋风今又是，换了人间。”



五省通衢牌坊。本报记者 孙博宇 摄
插图依托 AI 技术绘制